

# Literary Isomorphism and Significant Structure: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Reformism in *Les Misérables*

Ke Zhang Feilong Z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18,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the two theories in Goldman's genetic structuralism literary sociology, trying to interpret Hugo's revolutionary thought and spiritual pursuit in *Les Misérables*, explaining the revolutionary reflection in the text and the social criticism in reality, grasping the "meaningful" struc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revealing the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reformism throughout the text and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thinking for us to build an ideal world.

## Keywords

Goldman; genetic structuralism literary sociology; *Les Misérables*;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reformism

## 文学同构与意指性结构：《悲惨世界》中的革命精神与改良主义

张珂 张飞龙\*

河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河北石家庄 050018

## 摘要

论文采用戈德曼发生学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中的这两个理论，试图解读《悲惨世界》中雨果的革命思想和精神追求，解释文本内的革命反思与现实中的社会批判，把握二者之间“有意义的”结构联系，从而揭示出贯穿文本内外的革命精神与改良主义的内涵和实质，为我们建设理想的世界提供借鉴和思考。

## 关键词

戈德曼；发生学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悲惨世界》；革命精神与改良主义

## 1 引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吕西安·戈德曼在结合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精神，融合了文学艺术和社会历史的维度后，创造性地提出了发生学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理论。其“文学同构”与“意指性结构”理论意图寻找文学作品内部与现实社会中某个社会集团意识结构的链接以及发现文学创作与社会集体意指层次上的结构联系。《悲惨世界》就是一部需要从文本内外解读的伟大文学作品。雨果在故事叙述中夹杂了大量超越事件本身而触及灵魂的评论，但是大量的插叙和议论导致叙事经常性中断，干扰到我们对它的美学把握，并形成了具

有间断性情节发展的“叙事断裂”文学特征。

为了更好地整合断裂的叙事文本，论文运用发生学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在巴黎起义190周年和《悲惨世界》出版160周年纪念之际，重读《悲惨世界》，阐明巴黎起义的时代意义。同时，笔者也试图“理解”《悲惨世界》中巴黎起义的悲剧“世界观”，把握叙事断裂文本下内在的“意指性”逻辑以及“解释”雨果在叙事当中体现出的革命精神与改良主义。

## 2 巴黎起义社会背景的文学再现

雨果在描写巴黎起义时，一直强调革命观、群众和政府这三种因素在不同组合方式下的不同意义。他通过巴黎起义的开篇章节——第四部第一卷36页的内容，集中谈论了波旁王朝、路易·菲利普的历史和革命哲学，同时也在其他人物故事章节中描绘了一个贯穿社会各层的“悲剧世界”，并衬托出一个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当局政府的反面形象。最终，

【作者简介】张珂（2000-），男，中国山东临沂人，在读本科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通讯作者】张飞龙（1972-），男，中国河北保定人，博士，副教授，从事中外文学比较研究。

雨果组合起各因素指向巴黎革命的逻辑关系，“聚合”起群众与政府相对抗的集体情感。

这种民众与政府相对立的世界观不仅限于文本之中，更指向雨果生活的现实社会中，一种普遍的、对资产阶级政府不信任的“集体意识结构”。曾经在法国大革命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资产阶级，在复辟时期，却急于从“第三等级”脱离出来，以向波旁王朝展示他们的忠心，从而获得更大的政治和经济优势。最具代表性的是基佐和他的信条派。在基佐的带领下，他们推动了七月革命，拥护路易·菲利浦上台，随后又在1831选举改革中让中产阶级获得了更多的选举名额，并配合金融资产阶级获得政府的大量权力。渐渐地，奥尔良王朝的中流砥柱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商业团体和中等富有产者，议会系统也脱离民众被大中资产阶级主导。

但反观当时的经济模式，依然是“零碎化的市场、低生产率的农业、依赖于水和木材提供能源的小规模制造业<sup>[1]</sup>。”同时，“19世纪前半叶，巴黎的中间阶级数量只在绝对的量上，而在非相对的比例上有所增长，穷人仍然在数量上压倒性地超过了胜过宽裕的人<sup>[2]</sup>。”“穷人与富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在整个世纪的进程中始终静止不变，唯一变化的是，大富豪阶层数量的上涨，而中等富裕阶层的数量却下滑了<sup>[3]</sup>。”也就是说，此时整个法国的社会贫富差距在逐渐扩大，再加上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生产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政府与群众的割裂越来越深，资产阶级如今成为了“公民”的敌人。

于是，革命的火种又开始燃烧了。现实社会中对资产阶级的反抗意志，就通过雨果所描写的ABC朋友社等社团的沙龙活动，“同构”在了《悲惨世界》的文学文本中，即他们阅读“颠覆性”小册子、“抨击政府”，并且高呼：“统治我们的是资产阶级”“打倒私有制”……另外，雨果也插入了自己的革命宣言：“总之，重树社会真理，将宝座还给自由，将人权还给人民，将主权还给人<sup>[4]</sup>。”最终，在一片声讨声中，巴黎起义拉开了序幕。

### 3 反思革命：对革命意义的再探索

虽然在“崇高”理想的号召之下，巴黎起义能在没有完备的领导下得到群众的响应，但当几个街垒被一一镇压后，人们渐渐意识到，这群学生所领导的革命，最多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最终，人们抛弃了革命者，起义失败了。法国革命的曲折道路，刺激着知雨果反思历次革命的经验。当时的法国，文学世俗化的浪潮正不断发展，文学的社会影响力正不断扩大并现实化。因此，雨果秉持着针砭时弊的理念，选

择用《福音书》的结构去构思整篇《悲惨世界》，一方面总结法国的时代悲剧，另一方面也在探索革命悲剧的根源。

#### 3.1 难以整合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悲惨世界》里，雨果叙写了冉阿让和沙威的法律悲剧，芳汀和珂赛特的生存悲剧以及马吕斯的革命悲剧等。但如果打破这些故事的相对独立性，按照发生学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把文学现象置于社会整体后，便能发现这些悲剧人物实际上链接了现实社会与文学世界，揭示了当时社会各层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像冉阿让，他所希望的是基督般的博爱；沙威则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正平等；而马吕斯则选择自由……这些往往都是有产阶级才需要讨论的问题，而像芳汀、珂赛特这样的底层群众，他们仅有对下一顿面包的追求。我们必须承认，在不违背人类道德规范的前提下，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不同的理想都有着进步价值，但问题就在于一个国家如何整合不同的理想，来实现国家民族精神内核的塑造。法国始终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法国政权更迭的背后往往带有非常极端的政治主张，同一时间内对中间地带与反对力量的缓冲非常少。不承认缓冲地带存在的思想传统实际是从启蒙思想中开始萌芽的。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到《人权宣言》，他们一直在强调“公意表现”。因此，一个政府政治上的成功往往会被解释成前一届政府失败的原因，他们要做的事情便是尽力去推翻前一届政府的决议以及其代表的“公意”精神。由此，社会上一直存在着强烈的对立情绪，很难有一个政权能够得到大部分阶层的满意，各个政治团体也在为下一场政治斗争做准备。另外，缓冲地带的缺失也导致了社会双向沟通的堵塞，社会上层无法乃至无意了解民意，民情也很难传递到上层，上下层的割裂也在继续加深。

#### 3.2 缺少社会改造意义的革命

于是，革命，或者说大型的群众暴动，不再是非常艰难的选择，而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呼声。而当时的主流社会，在面对政府施政不利，革命起义频繁，革命弊端无法消除的情况下，却在没过去多久的大革命中找到了解释，那就是——自由。这里的自由，更多是“革命的自由”。“从政府篡夺了主权的那个时候起，社会制约就被破坏了，于是每个公民就当然地又恢复了他们天然的自由，这时他们的服从就是被迫的而不是根据义务的了……当人民被迫服从时，他们做得对；一旦公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因为人民正是根据别人剥夺他们的自由所根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他们的自由的<sup>[5]</sup>。”在卢梭的启蒙下，

雨果也在《悲惨世界》中高呼：“革命观就是一种道德观……全民的法律，就是自由；根据罗伯斯庇尔令人叹服的定义：自由止于他人自由的起始。自从1789年以来，全体人民以崇高化的个体成长壮大<sup>[4]</sup>。”后革命时期的法国，继续着“革命的自由”。在革命中，人们追求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又感受着革命的英雄主义以及浪漫主义。

但就如雨果所批判的：“凡是针对政府或政体的起义，总要瞄准更高的目标<sup>[4]</sup>。”后革命时期的斗争只顾模仿前革命时期宏大的群众性特点，而不顾及更深层次下新秩序的建设，尊重历史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思想传统一直没有被总结出来。另外，法国依旧还没有放弃他们对革命的固有看法，即：“只有经历一次天翻地覆的动乱，困难才能得到纠正。”他们依旧将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于一次性的顶层设计改良，希望通过革命，在短时间内理顺一切矛盾，然后所有的社会弊端便能迎刃而解。因此，革命并没有带给法国实质性进步。

基于辩证的革命批判，雨果对巴黎起义的总评价是“乌托邦转化为起义，哲学的抗议转化为武装抗议，密涅瓦转化为帕拉斯<sup>[4]</sup>”；暴动则是“明天的真理，却向昨天的谎言借用了战争的手段<sup>[4]</sup>”；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乌托邦的崇高就在于能接受遗弃。它无坚不摧<sup>[4]</sup>”；评论的最后，雨果又引出了革命的最终目标：“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的受苦人，真正名称叫：‘进步’<sup>[4]</sup>”。这种对社会秩序重建意义的探索，构成了雨果反思革命的“意指性”思想基础，也解释了雨果“叙事断裂”模式的“意指性”问题。雨果曾间接参与了镇压1848年街垒起义，这段经历使他有可能会更直观认识到革命的本质与不足。因此，为了让法国人民更深刻地意识到“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使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梦想<sup>[6]</sup>”，他采取大量插入议论和评论的文学创作手法，直抒胸臆地书写着对巴黎起义的批判，并警醒世人——革命不仅仅是去追求自由平等博爱，更是要为创建理想国指引方向。

## 4 雨果的理想：社会改良与人道主义革命

怀着对革命失败的哀悼，对革命志士牺牲的惋惜以及对社会进步的渴望，雨果希望用悲悯而又沉重的人道主义，去弥合法国社会的裂痕。因此，他创作了“文人英雄”——冉阿让的形象，体现其在革命批判后整合出的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兼有改良主义与革命精神的社会理想。

### 4.1 和平时期的改良主义

革命的巨大代价，让雨果始终保有一个不需要借助暴力

手段而解决社会矛盾的理想，这一方式，便是社会改良。其精神内核，集中在第一部第二卷中冉阿让的康德式道德法庭描写。

首先，他肯定了贫困的人也是有良知的。这种良知，就是法国人有希望的体现。雨果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他说：“上帝造出禽兽就是不可教育的，何必教育禽兽呢？反之，灵魂既是实存，既有特定的目的，上帝就赋予智慧，也就是说赋予可教育性。有良好的社会教育，任何类型的灵魂都能发挥蕴含的作用<sup>[4]</sup>。”这段论述总结了雨果的“性善论”，他认为，上帝创造人，只要保证了后天的教育，他们便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了。就如后面马德兰市长对当地的一群除草人所说的：“朋友们，记住这一点：世上既没有莠草，也没有坏人，只有糟糕的庄稼人。”

其次，雨果从法律的平等性以及教化意义入手，否定了法律体系的权威。就如同托克维尔所讲的：“法国司法制度在个人对国家的保障上软弱无力，在法国这样一个民主社会里，这是永远必须加强的一个方面<sup>[7]</sup>。”雨果用“天平比喻”，认为对于穷人来说惩罚那一侧的天平的盘子更重，结果法律就成了受害者的法律了，也就是“最终把权利赋予侵犯人权的一方”，这就构成了“社会对个人的犯罪”“最强者对最弱者的侵害”，因而针对弱者的悲剧不断发生。

最后，基于“性善论”和法律缺少的道德改造意义，雨果给出了他的社会改良方案——希望社会给予穷人更多的扶助和照顾。例如，提供“工作”和“减少惩罚”。雨果用冉阿让改造蒙特勒伊市的情节，证明了他改良主义的有效性。但是立足点是基于“财富分配往往是偶然造成的”，动荡的社会局势使社会结构不断洗牌，时代的局限性让雨果把贫富差距归结于“偶然”的因素。但进步性意义在于，他承认合法性财产收入，希望通过人性、正义、良知等人类最本质最纯洁的心理给社会问题去打补丁，而不是像当年的革命派把财产变为区分阶级的指标进行暴力的“平等”改造。这反映了法国已经在审视平等的深刻含义，思考是追求结果的平等，还是过程的平等。这是用几十年的牺牲换来的经验和教训。

### 4.2 基于人道主义的改良式革命

在和平时期，雨果希望用人道主义改良“悲惨世界”。但当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时，为了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彼岸世界，雨果选择坚定地与革命站在一起。然而在人们狂热地追求自由、平等时，博爱的链条却被打破，社会缺少了容忍度，革命的悲剧开始发生。此时的雨果选择以人道主义的改良主义、基督式的普世价值补齐在革命中缺失的博爱，因

此有了后文冉阿让“用枪行善”式的革命，对仇敌沙威的释然，对马吕斯的拯救，一直到最后在弥留之际对马吕斯珂赛特结合的祝福。雨果通过冉阿让的视角，阐释了他对革命辩证地理解——既有对法国未来的期盼，又带有对革命普世价值的肯定，同时也有对革命性质的反思，对革命英雄死亡的惋惜。就如同在文中所写道的：“公民们，在未来的时代，既没有黑暗，也没有雷击，既没有有凶残的蒙昧，也没有血腥的报复了。既然没有了撒旦，除魔大天使也就不存在了。到了未来，彼此再也不会杀戮，大地将阳光灿烂，人类就只有爱心。公民们，那一天必定会到来，到那时候，一切都融洽、和谐、光明、快乐和生机勃勃，那一天一定能来到。我们正是为此才献出生命<sup>[4]</sup>。”

出于西方中产阶级长久以来对宗教势力的认可以及对社会秩序的向往，欧洲伟大作家普遍逃不脱宗教对世俗事务干预的窠臼，所以上帝救赎式的改良代替了社会政治的改进。但雨果的进步在于他既肯定了代表人道主义的“人民”与“秩序”，又认可了代表革命的“自由”。正是这种兼有人道主义与革命性质的文学特征，使雨果从同时期的作家中脱颖而出。“托尔斯泰明确提出勿以暴力抗恶，狄更斯则害怕、逃避暴力革命。雨果虽然有时不免把革命和人性、人道、爱对立起来，但他更多的是理解、同情甚至赞美革命<sup>[8]</sup>。”这种敢为人先的革命意识，也使《悲惨世界》的内容不断外延，从社会小说不断扩充为哲理小说、宗教小说、政论小说。最终《悲惨世界》凭借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被誉为“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

## 5 结语

在《九三年》中雨果写到：“At absolutely correct there is a revolution based on absolutely right humanitarian.”（在绝

对正确之处，往往会爆发基于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革命），其意涵非常明确，缺乏人道主义关怀的革命，其性质让人质疑。虽然法国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但从历次革命的过程中看，其依然与理想相去甚远。法国正是在这条革命的道路上受尽了挫折，雨果才在《悲惨世界》中探讨了革命的本质，以期后人不要忘记在追寻理想时因为过激行为所犯的过错。即将到来的2022年，是巴黎起义190周年纪念年，同样也是其最伟大的记录篇章《悲惨世界》出版的160周年纪念年。值此之际，有必要重读《悲惨世界》中的巴黎起义，感受这部作品的时代意义，不仅是为了重新回顾我们建设理想世界的“初心”，更重要的是给予我们建设新世界的勇气和责任。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重读这部作品，将为我们创新性建设新中国、新世界提供新思路。

## 参考文献

- [1] [美]萨拉·梅萨.法国资产阶级:一个神话[M].郭科,任舒怀,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 [2] M Robert, Adeline Daumard. La bourgeoisie parisienne de 1815 à 1848[Z].Paris: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Etudes, VIe section, Démographie et société, VIII,1966.
- [3] Adeline Daumard. Les Bourgeois et la bourgeoisie en France depuis 1815 [M].Paris: Aubier,1987.
- [4] [法]雨果.悲惨世界[M].李玉民,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
- [5]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6] [法]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7]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8] 李倩.人性 人道 革命和爱——雨果小说对爱的独特理解[J].淮阴师专学报,1996(3):19-22.